

汉语史词汇研究丛书

中古近代汉语探微

董志翹 著

中华书局

国家“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目 录

序	(1)
21 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随想	(1)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	(10)
训诂学与汉语史研究	(39)
汉文佛教文献语言研究与训诂学	(50)
汉译佛典的今注今译与中古汉语词语研究	
——以《贤愚经》《杂宝藏经》译注本为例	(64)
试论《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语料价值	(75)
《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	(90)
故训资料的利用与古汉语词汇研究	
——兼评《故训汇纂》的学术价值	(103)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比数”新解	(114)
扬雄《方言》与中古、近代汉语词语溯源(二例)	(123)
佛教文献与《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释	(129)
《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索	(145)
中古汉语中的“快”及与其相关的词语	(163)
汉译佛典中形容词的“同义复叠”修饰	(171)
中土佛教文献词语零札	(188)
中华版《高僧传》校点商补	(203)
梁《高僧传》“疆场”例质疑	(214)

“儿”后缀的形成及其判定

——兼与竺家宁先生商榷	(218)
《唐律疏议》词语杂考	(229)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略考	(246)
汉语词汇研究与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	(257)
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校理(上)	(267)
辑注本《启颜录》商补	(279)
《法苑珠林校注》匡补	(300)
笔记小说与语言文字研究	(314)
《太平广记》词语辑释	(340)
四川方言中的“老几”、“几娘”	(352)
关于助词“等”表列举后煞尾用法的时代	(358)
《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序	(361)
《〈洛阳伽蓝记〉词汇研究》序	(366)
漫谈汉语史论文的写作	(369)
无尽的怀念	
——悼入矢义高先生	(383)
本书重要词语音序索引	(387)

序

2000年2月，我受聘从四川大学来到南京师范大学任教。

其实，南京师范大学也是我的母校，1979年秋，刚在苏州大学任教不久的我，由学校委派，来到南师大中文系，跟随著名语言学家徐复教授进修古代汉语。在为期一年的进修中，我有幸听了徐复教授为他的第一届研究生所授的课程，同时也听了南师大钱玄教授、张芷教授、张拱贵教授的授课。南师大与南京大学近在咫尺，当时，我们每天奔波于两校之间，于是，我也有幸选修了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为他的研究生开设的校雠学课程，鲍明炜教授、徐家婷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音韵学、文字学课程。更为幸运的是，南京大学著名训诂学家洪诚教授，其时正受教育部的委托，举办全国首届高校训诂学师资讲习班。天赐良机自不可失，经徐复先生介绍，得到洪诚先生的应允之后，我也厕身其间，听完了训诂学课程。一年进修时间虽短，但就在这紧张而充实的一年中，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的诸多名师将我领入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殿堂，为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传统语言文字学功底，从这里我迈出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教学的第一步。

后来，我一直在苏州大学任教。到了1995年，为了拓宽学术视野，继续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学素养，我报考了著名语言学家四川大学中文系张永言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在张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对汉语史，特别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1997年毕业后，留在川大汉语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年，然后就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有时，人生的道路就像是画了一个圈，离开二十年后，竟又来到了学术生涯的起点，徜徉在东方最美丽的校园——

南师大的随园，就像游子回到了离别已久的故乡。是真？是梦？竟有些恍惚。

一晃间，来到南师大又已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中，我与南师大的同仁忧喜与共，为申报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为建设汉语言文字学重点学科，为完成“十五”、“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成天忙碌。同时，因讲授博士、硕士、本科生课程和指导博士、硕士、本科生而来回奔波（在老校区与新校区之间），七年的两千五百多个日夜，一言以蔽之，就是忙！但是不管怎么忙，作为一个学人，读书、研究是立身之本，不可暂忘。白天没有工夫，那么，就晚上抓紧。每当夜深人静，城市的喧嚣退去之后，就是我的读书、写作时间。网上有消息说我是每天四个小时睡眠的实践者，这肯定是误传，但多年来我确实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六小时的睡眠时间（幸好，我的睡眠质量一流，常常刚接触枕头就已进入梦乡，故六个小时足矣）。七年来，发表于国内外学术刊物上的50多篇论文大多就是这样利用夜间与假期写就的。因为只要一想到我校的徐复教授、钱玄教授等老一辈的学者在八九十岁的高龄还每天笔耕不辍，退休以后还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著述，一想到远在成都的导师张永言教授每次电话中都会加上一句“最近写了些什么？寄来让我看看”，这便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激励。

今天，这个集子里的三十二篇文章就是从这七年的文章中挑选出来的，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八篇，是汉语史和训诂学的通论，大致都与中古、近代文献语言有关。

第二部分十篇，偏重于中古汉语词语的考释及溯源。

第三部分八篇，偏重于近代汉语词语的研究。

第四部分六篇，虽为杂谈、序言和回忆，但都与中古、近代汉语研究有某些联系。

“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以上文章大多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头审视，遗憾不少。但此次结集，为保留历史原貌，除明显的字、句错误外，未作大的改动（只有少数几篇文章，发表时限于篇幅，作了大段删削，有的删削或多或少影响了意思的表

达,现据原稿补出)。我恳切等待着方家与同道的批评指教。

最后还要感谢中华书局责任编辑舒琴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董志翹

丁亥夏于金陵龙江

21 世纪中古、近代汉语 词汇研究随想

就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中古汉语”是指后汉至隋这一历史时期的汉语，“近代汉语”是指唐代到清代初期这一历史时期的汉语。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当然属于历史词汇学的范畴。20 世纪末（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在吕叔湘、郭在贻等先生的倡导下，一批中青年学者投身其间，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研究的对象触及笔记小说、史书、诗歌、医农科技等杂书以及汉译佛典等，出版的专著有数十部，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过去重两头（上古、现代）、轻中间的现象有了很大改观，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阶段的研究，不可讳言，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而这些不足，都需要我们在新世纪中加以解决。就个人管见，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①里首次提出了“共时”、“历时”的概念，他对“共时”、“历时”的解释是：“有关我们这门科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共时和历时分别指一种语言状态和一种演化情况。”这两者对于我们词汇史研究来说是

^①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相互为用的。比如：我们静态描写、分析某一特定时代的某一语料、或某一特定时代的某一些语料的词汇状况，这是共时的工作。但是在这一工作的同时或完成后，来与其他时代的语料进行比较，说明这一语料的词汇有什么特点，对前代的词汇有什么继承发展，对后代词汇有什么影响，在汉语词汇史上有什么价值，处于什么地位等，这些都属于历时的研究。对于我们汉语史工作者来说，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20世纪末，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的来看，仍处于起始阶段，一是虽然对中古的各类语料均已有过触及，但是深度还不够，特别是汉语词汇研究大体上还囿于传统训诂学的路子，词语考释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对中古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词语历来的学者注意较少，语文性工具书中也很少收录，因此缺少古注、旧注的依傍，这类考释大多是在排比同类用例的情况下归纳出来的，更接近于传统训诂式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静态共时研究的层面。词语考释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对词义都不能确切理解，则更遑论史的研究。训诂学是我国传统小学的一门，汉语词汇史研究可从中汲取很多营养，这都是不必多说的常识。但汉语史研究毕竟不等于训诂学，除了对一些词语的生僻意义的考释之外，还有同源词的研究、常用词演变的研究、构词法的研究、各阶段词汇系统的研究等任务。而至目前为止，尚缺少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中古、近代的词汇状况进行理论方面的阐述和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

再者，随着大型语料库的建立（如《四库全书》检索系统、《国学宝典》检索系统、《大正藏》检索系统）、电子文献的增多、检索手段的进步，以例取胜，排比归纳类训诂式的研究将面临挑战。我曾对敦煌文献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的“色力”一词作过考辨，花了近一周时间翻阅《大正藏》，终于在汉译佛典中找到近10个用例，写成一篇小文。后来有了《大正藏》光盘及电脑检索系统，一查检便得数十例，且有更为典型的用例，而这一工作是在几分钟之内完成的。要看原文，只要点击一下，就进入原文。不仅快捷，而且很少遗漏。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节省出来的时间及更多的精力放到语料的分析及深加工上，放在总结发展演变规律并升华为理论的工作上。目前已经具备了对某一时

代的词汇现象进行穷尽性的定量分析的条件,且已有前期取得的微观研究的大量成果,所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企盼着有更多的从宏观角度、从理论角度研究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论著。

二、古今打通,学科打通(所谓纵通与横通)

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原来分为“汉语史”及“现代汉语”两个学科,现在整合为“汉语言文字学”,其目的也就在此。中古、近代汉语词汇主要是指汉魏以降的方俗语词汇,历来它们很少有进入正统文献的机会,而大多只能在民间使用流传,遗存在各地的方言俗语中。因此进行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必须与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如鲁国尧先生在为拙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①所撰的序言中就讲到:要将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和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有不少人著文,考释魏晋南北朝时期“叛”不是叛变义,而是“逃避”义。后发现清代和民国几本苏南地方志中也有“叛”字,表逃避义(隋颜之推《还冤志》:“又云:‘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头如被系,欲逃不得。’”),后请人调查,上海、崇明、苏州、常州、无锡、宜兴、昆山、吴江及浙江的不少方言中现在还在使用。所以鲁先生说:“现在不是提倡学科交叉吗,不是提倡边缘科学吗?如果词汇史专家尤其是研究近代、中古词汇的学人在古籍中搜集词语例证时,同时把视线也倾注于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使两个分支学科交融,合则双美,20世纪上半期的一位大师曾提倡‘双重证据法’,这以书面文献材料结合活方言的方法不也合乎大师的神旨么?”

鲁先生的意见确实为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指出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比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②前集卷之一:“中宗景龙中,召学士赐猎,作吐陪行,前方后圆也。有二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

① 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

能取之。’乃悬死鼠于鸢足，联其目，放而钓焉，二雕果击于鸢盘。狡兔起前，上举挝击毙之，帝称那庚，从臣皆呼万岁。”“帝称那庚”之“那庚”是什么意思？《汉语大词典》中释为“如何；怎样”，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在近代汉语中仅此一例，苦无旁证。然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代方言，则惊喜地发现，它还活跃在吴方言、赣方言口语中。浙江方言中有一“那格”，意即为“如何；怎样”。浙江富阳《富春儿歌十则》：“金线银线扳上起。那格落来？”又上海、松江、苏州等方言中有个“那介”，亦为“如何；怎样”义。清茹敦和《越言释》：“今越人以……如何为那介。”《浙江嵊县歌谣》：“依那介走走上起，……依那介走走落来。”而上海，江苏苏州、无锡、昆山、江阴、沙州，浙江，江西临川等地还有个“那亨”（字又作“那哼”），苏剧《花魁记》：“多出点银子，把她买了回来，岂不是要那亨就那亨。”江西临川：“那亨才好？”^①《广韵》：庚，见母庚韵开口二等平声梗摄；格：见母陌韵开口二等入声梗摄；介：见母怪韵开口二等去声蟹摄；亨：晓母庚韵开口二等平声梗摄。故“庚”、“格”、“介”同为见母，乃一声之转。“庚”、“亨”同为庚韵，声见、晓为喉牙音转。近代汉语中之“那庚”，与现代方言中之“那格”、“那介”、“那亨”为同一词语的不同变体而已。

再如《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浮梁张令”（出《纂异记》）：“吏曰：‘吾姓钟，生为宜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免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闾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其中“饱神盘子矣”一句殊不可解，历来注释本、今译本均避而不谈。而《汉语方言大词典》云：“盘（名）：祭祀献神和死者的馒头，顶上有枣子，兰银官话，甘肃兰州。”于是恍然大悟，这是钟姓鬼吏求托浮梁张令之语，所谓“饱神盘子矣”，即谓：如果浮梁张令能兑现对金天王所许之愿，并托金天王将钟姓鬼吏从递符脚力转为闾人，那么就可饱享人间供奉神、鬼之食了（“盘子”即兰州方言中之“盘”，指祭祀供神及死者的馒头）。有时这种联系，不仅限于国内，甚至可以扩展到亲属语言、有渊源关系的外国语中去，将研究的视野

^①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

放开。

我们认为任何研究应尽量古今通观,前后关照。科学贵在能分,但我们也应看到通合的长处,分是基础,合是旨归。唯分可以析其精,唯合可以释其全,如彼此互为畛域,可能会窒碍学术的发展。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是我们学子治学的楷模。

三、中土传世文献词汇研究与 汉译佛典词汇研究

能否发掘使用新的研究材料,是研究成败的关键之一。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以中古汉语文献为例,由于当时战乱频仍,文献典籍遭到严重摧毁,中土文献传世不多,加上历来有文化的人一般重“文”轻“俗”,因而其中能较好反映当时口语特点的中土文献更是凤毛麟角。篇幅较大、语料价值较高的中土文献:文学类有《世说新语》及刘注,史学类有《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宋书》、《魏书》,政治哲学类有《论衡》、《颜氏家训》,地理类有《水经注》;科技类有一些医书及农书《齐民要术》等。本来中古时期志怪小说十分发达,见于著录的不下三四十种,但其中极大部分原本早已散佚,经后人辑缀而成,并非古本原貌,作为语料不甚可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较有价值,但数量不多,晋人杂帖口语程度很高,但数量更少,且大都为片言只语。除此以外,中古时期的文献几乎都用极少透露当时口语消息的文言文写成。

正因如此,所以在汉语史研究中,以往对上古阶段、现代阶段的语言研究较为集中,而中古、近代阶段较为薄弱。但是汉语史研究跳过中间阶段,终究不是完备的汉语史,同时也讲不清楚汉语演变的来龙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去脉(文革后,虽然有很多中青年语言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古汉语,如对以上所举的中古中土文献几乎都作了很好的研究,但由于语料数量的局限,还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寻找较为集中的能较好反映中古实际语言的文献语料。经过研究者的努力,终于开掘出了中古语言的富矿——汉译佛典。虽然从三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这方面有过研究,但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直到编纂《汉语大词典》,例证中仍较少采用这类材料。总之,从东汉至宋,汉文佛典总数达 2148 部,8736 卷,中古时期的汉文佛典约 960 部,2990 卷,2400 万字。与这一时期的中土口语性文献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近年来对汉译佛典词汇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相当的重视,除对佛教传入外来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音译词、意译词、构词法的研究而外,更多的是对汉译佛典中的俗语词进行研究,取得的成绩不可低估。

但存在的问题也是突出的,除了前面所说的停留于训诂层面外,还集中在一些比较流行的篇目,如《中本起经》、《六度集经》、《贤愚经》、《百喻经》等。其实面还可以扩大,从汉语词汇史研究而言,除了佛经中一些故事性较强的篇目外,律部的日常生活方面的词语研究还大有可为。另外,我们还可根据译经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时期的研究。荷兰学者许理和(E. Zürcher, 1977)用东汉 29 部佛典作为主要材料,讨论了当时的口语成分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①。还可以分体裁、分译者进行研究。比如三国吴支谦译有 27 部经,西晋竺法护译有 85 部经,对它的词汇现象均可作专题研究。若以比较研究而言,则可进行译经词汇与原典词汇的比较(当然这首先要懂梵文、巴利文等),节译本、异译本词汇对照研究等。

虽然说汉译佛典面广量大,有其不小的研究价值,但本人认为:在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还是要以中土传世的口语性文献为主要对象,汉译佛典主要是作为旁证材料。这是因为不少汉译佛典的时

^① [荷兰]许理和撰,蒋绍愚译《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代性不很清晰。同时毕竟是宗教文献,语言中宗教性太强,有些词语仅出现于佛典,而在中土其他文献中从未见过,有其体裁的特殊性。再加上是汉语译文,难免受到原典语言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一些特殊情况当作汉语的普遍规律,那就有很大的危险性。这是本人近年来阅读汉译佛典的一点体会,借此机会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四、关于“分领域”词汇研究

陆俭明先生在吉林大学召开的“中国语言文字学 2002 高级论坛”上指出:“要加强领域语言的研究,如法律、广告、新闻等语言的研究。”依据社会分工的不同,可以划分出一系列语域或者建构层级体系。在古代社会,很早就形成了经济、巫术、军事、政治、教化等专门性语域。在近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则形成了更为多样性的若干语域。日常性语层可以划分为家庭交流语域和社会交往语域。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建设导致行业分工,行业性语层可以划分为经济语域(生产性、流通性、服务性和管理性)、公务语域(政务性、政论性)、法律语域、传媒语域(新闻传媒、出版传媒、影视传媒)、教育语域、竞技语域等。精神文化的要求导致精神文化生产的专门性分工,一方面在日常言语基础上产生了形象思维充分发展的艺术性语层,形成了文学、表演、美术等语域;另一方面在日常言语基础上产生了抽象思维充分发展的思辨性语层,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等语域。

以前我们汉语史研究注重的是时(时代性)、空(地域性,方言)两个方面,而 21 世纪要能在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上深入下去,除了关注时空因素,还应注意各领域的词汇差别,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地统称为六朝词汇、唐代词汇、宋代词汇。《宋语言词典》就存在这样的毛病^①。

日本著名汉学家入矢义高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为了强调共时、历时的观点,文献的搜寻范围已扩展到汉译佛典、禅宗语录、法帖、法

^① 董志翘《评〈宋语言词典〉》,《辞书研究》2000 年第 1 期。

制文书、医籍、占卜书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关于汉译佛典，太田辰夫先生已经首先提出要谨慎对待，但是有的中国学者依然比较随意地取用。举例来说，‘结使’在初期的译经中经常用作‘烦恼’义，于是有不少学者将此作为魏晋时期的通语。事实果真如此吗？那么为什么我在佛典之外的当时文献中从未见到过这个词？同样，关于前举的医籍等技术书中出现的‘特殊’术语，也应该谨慎对待。从禅宗语录中收集语言材料，这也是当前的一个明显的趋向。不过，还是要避免不加区别地随意取用。比方‘知有’这个短语，成了表示‘知道’义的词，还有语录里习用的‘与没’、‘与么’、‘恁么’是可以作为通语来对待，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考虑，为什么一般的诗文、变文中几乎不用这些词的问题。现在很少有人全面地进行探讨，还缺乏这样的远见卓识。”^①

各个领域的文献中就各有不少专业领域术语。与通用于各领域的一般词语相比较，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如：

“行人”，在一般文献中，均指“行路、征行之人”。如《管子·轻重己》：“十日之内，室无处女，路无行人。”杜甫《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而在作为法制文书的《唐律疏议》中，既有指一般行路之人的用例，如卷二十六“杂律”：“【疏】若立标识，仍有杀伤，此由行人自犯，施机枪、坑穿者不坐。”卷二十八“捕亡律”“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但作为法制专门术语中的“行人”则指“施行犯罪活动的人”，如卷二十“贼盗律”：“若造意者不行，又不受分，即以行人专进止者为首，造意者为从，至死者减一等。”“【疏】问曰：有人行盗，其主先不同谋，乃遣部曲、奴婢随他人盗。为遣行人元谋作首？欲令部曲、奴婢主作首？”因此，在《唐律疏议》中，共同施行犯罪活动的则称为“同行”，如卷二十九“断狱律”：“【疏】议曰：‘囚在禁，妄引人为徒倡者’，谓盗发者，妄引人为同盗；杀人者，妄引人为同行之类。”

在佛教文献中，“行人”虽然也有“行路、征行之人”的一般用法，如

^① [日]入矢义高《盐见邦彦著〈唐诗口语の研究〉序》，日本中国书店1995年（注：原为日文，由笔者译为中文）。

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譬如城内高广平地，四交道头起大高楼，明目之士在上而观，见诸行人东西南北，举动所为皆悉见之。”（1—86）但更为普遍的却是指“修行之人”。如后秦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以是故知：欲求善果报，临命终时心马不乱，则得随意。往不可不先调直心马，若不先调直心马，死贼卒至，心马盘回终不如意。犹如王马不能破贼保全其国。是以行人善心不可不常在于胸心。”（4—532）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华手经》：“我是行人彼非行者，是诸众生瞋恚炽盛，多诸恼患。我愿欲得是大智慧最妙之身，我若与此瞋恚恼病众生同者，有何差别？我是行人彼非行者，当自调伏于众生中，不生瞋恼。”（16—170）姚秦竺佛念译《菩萨瓔珞经》：“所谓无上定者，心有上中下。行人入定无复出入长短息，惟分别刹土专心一意，观过去未来现在，何者是我所化非我所化。”（16—23）北凉昙无讖译《佛所行赞经》：“专心修苦行，节身而忘餐。净心守斋戒，行人所不堪。”（4—24）北凉昙无讖译《大方等大集经》：“坐禅行人乐阿兰若，能除一切种种诸患，能却一切斗争怨家。”（13—264）

因此，本人目前的一个课题是“唐五代散文性文献词汇研究”，首先“散文”有别于“韵文”（以前对“韵文”词汇研究关注的较多，如唐五代的诗词词汇研究：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绍愚的《唐诗语言研究》、盐见邦彦的《唐诗口语の研究》等），同时在散文中再分领域，如笔记小说、史籍、法制文书、佛教典籍、医籍、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等，在此基础上再来汇总区分当时的通语及专业性词汇。

（原载《21 世纪的中国语言研究》〔一〕，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

关于中古汉语的起迄,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指东汉至隋(公元1世纪到7世纪初)。中古汉语语法,也就是指这一时期的汉语语法。中古汉语这一分期的明确虽然为时较晚,但对这一时期汉语语法的研究却很早就开始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前辈开此先河;五六十年代,洪诚、刘世儒、周法高、祝敏彻等学者继续研究。引起广泛的重视并较为深入地开展研究,当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二十多年间,新人辈出,成果丰硕,无论是涉及的领域、掌握的材料、运用的方法,还是理论的建树,都有突破性的进展。今就笔者所见,择其要作一综述,以展示这一方面研究概貌。

语法研究,一般包括句法研究和词法研究。学者们对中古汉语语法的研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的,下面就按句法研究和词法研究分别评述。

中古汉语句法研究

中古汉语句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判断句、被动句、疑问句、存在句、动补结构、双宾语结构和处置式等方面。

判断句的研究

判断句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判断词的产生与发展,“是”作为现代汉